

暴力，作为西方文明的本质特征——《杀戮欲》译序

姚建彬

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暴力可谓无处不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随时都可能与暴力照面。据统计，全球每年至少有 150 万人死于暴力，其中 50% 以上由自杀所致，大约 35% 由于他杀所致。而暴力的起源，暴力的形式，暴力的危害和后果则是多种多样的。

有关暴力，国内外学界已经有许多的讨论和研究。比如，瓦尔特·本雅明批判的是所谓“神圣的暴力”，他要人们区分合法的暴力与非法的暴力，并且检讨暴力的功能¹；齐泽克所关注的则是内在于体制的暴力或者体制暴力²；约翰·多克尔从文学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切入，特别着力讨论种族屠杀、宗教与历史的关系，他所关注的不是个体之间的暴力，而是集体之间的暴力³；利萨·瑟里奇关注的则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中的婚姻暴力⁴。至于从社会学、精神分析学、人类学、新闻传播学、语言学、生物学、遗传学、犯罪学角度来研究暴力的著述也所在皆是，它们要么关注的是校园暴力，要么关注的是家庭暴力，要么关注的是种族冲突的暴力，要么关注的是媒介暴力，要么关注的是性暴力，要么关注的是肢体暴力。总体而言，这些现有的关于暴力的研究，不少都失之狭隘、缺少批判和反思精神。这种情况，在我国现有的关于暴力的研究领域表现得甚为明显。我国现有的关于暴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于家庭暴力⁵、校园暴力⁶、暴力犯罪⁷等暴力形式的探讨，缺少从形而上层面对于暴力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从篇幅上看，雅各比的《杀戮欲》不过是一本小书，但是，如果将它放在目前所有关于暴力的研究著述中，它又是非常特别、非常能够激发人思考的。这种特别、这种发人深省，就在于雅各比提出了一些具有颠覆性的见解：第一，暴力的主要形式是兄弟相残；第二，陌生人对于我们的威胁，要小于熟悉的人对我们的威胁；第三，暴力最常见的形式，就是存在于熟人们或邻居们或者诸民族内部有亲属关系的社区之间的暴力——那些显然夸大或者缩小了的内战；第四，一般而言，各种各样的内战总是比国家对国家的那些战争更为残暴，而且具有更为持久的种种后果，内战正日益成为当代冲突的特征；第五，大多数犯罪性暴力都发生在彼此认识的人们之间，从袭击到种族灭绝，从暗杀到屠杀，暴力通常都从具有共同志趣的人们内部冒出来，而不是从其外部出现；第六，相似，而并非暴力，是激发暴力的根源，弗洛伊德对于“对细微差别的自恋”也许有助于揭示自相残杀暴力的

¹ Walter Benjamin, *Reflections: Essays, Aphorism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8. pp.277-300.

² Slavoj Žižek, *Violence: Six Sideways Reflections*. New York: Picador, 2008, p.9.

³ John Docker, *The Origins of Violence: Religion, History and Genocide*. London: Pluto Press, 2008.

⁴ Lisa Surridge, *Bleak Houses: Martial Violence in Victorian Fiction*.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5.

⁵ 如卫华：《家庭暴力》，济南出版社，2004年；张李玺：《中国家庭暴力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⁶ 如徐久生：《校园暴力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姚建彬主编：《校园暴力控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⁷ 如叶高峰：《中国暴力犯罪对策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杨征：《暴力恐怖犯罪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

秘密来源，恰恰是那些在其他方面相似的人们之间的诸种细微差异，激发了他们之间的陌生感和敌意，借用吉拉尔的话来说就是，“相似导致挑衅和对抗”⁸。

雅各比对于暴力的诸种根源所发表的上述见解，可以归结为一个总体性的论断：兄弟相残的暴力是西方文明的基本特征，它不仅伴随着西方文化的始终，参与并见证西方文化的发展、演变历程，也构成了西方文化中一些奠基性文本⁹的重要特征。

雅各比的这一断言，无疑是对于西方人针对西方文化所拥有的似是而非论调的一种深刻针砭，大有将西方人从其沾沾自喜的文化迷梦中惊醒的意味。西方人传统的集体智慧认为，危险来自于陌生人，危险来自于他者，“敌人们就潜藏在街上和街外”，挑战西方人的生活方式的只能是陌生人。然而雅各比的诊断，无疑同西方人相沿成习的常识针锋相对。这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教授以一种极为敏锐的眼光和批判性思维所提出的见解，让我们对于西方文明史的重要特点之一，获得了极具启发性的了解和认识。雅各比所提出的上述观念，其所揭示的一些真相以及他在本书中所展开的分析和论述，至少对四种流行的似是而非的谬见提出了挑战。第一种流行的谬见是，暴力来自于“他者”和“陌生人”；第二种流行的谬见是，西方文明是优雅的、开化的；第三种流行的谬见是，我们（西方人）害怕并伤害那些与我们不一样的人；第四种流行的谬见是，自“9.11”事件以来，西方社会愈加以“文明的冲突”来审视西方社会与其他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

公正地说，雅各比的主张，挑战的不仅是西方社会流行的上述谬见，而且也挑战了非西方社会类似的谬见，因为人们通常都认为暴力来自于陌生人，来自于外部世界，来自于异邦或他乡。威胁我们的并非陌生人，而是熟人，雅各比的这一看法或许会令我们感到尴尬，感到不安，感到恐怖。但是，从雅各比在《杀戮欲》一书中所作的梳理来看，无论是从暴力的种种根源，还是从暴力的发展演变轨迹、暴力带来的后果、暴力的预防等方面来看，这一论断都具有不容否认的真理性，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西方文明，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尽管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暴力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然而，按照雅各比的看法，暴力是西方文明的本质特征，这是我们理解和评价雅各比 2011 年推出的新书《杀戮欲》的关键所在，也是我们审视西方文明，从对于本书的阅读之中获得启迪或者反省所需要掌握的核心密码。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所谓暴力，就是指故意使用体力或强力，威胁或者实际上反对自己，或者反对他人，或者反对团体或者社群，导致或者极有可能导致伤害、死亡、心理创伤、畸形或者损失。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给暴力下一种宽泛的定义：暴力即不符合法律和道德规范的力量，泛指侵害他人人身、财产、精神的强暴行为。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文明史，就是在暴力的伴随之下艰难前行的。“一部文明史也就是人类同自己的暴力倾向作斗争的历史”。¹⁰从世界范围内来说，西方文明与暴力的关系是极为紧密，也极为独特的。正如雅各比所说，暴力是西方文明的基本特征。从这一看法出发，我们自然不难理解，暴力与西方人的生活密切相关，暴力渗透在西方人的生活与文

⁸ René Girard, *Violence and the Sacred*, trans. Patrick Gregor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46.

⁹ 比如《俄狄浦斯王》、《底比斯战纪》、《圣经》等等。

¹⁰ 陈嘉放、邓鹏：《文明与暴力·前言》，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第9页。

化的方方面面。比如，在西方人的服饰打扮中，我们就不难看到暴力的身影：有的人用人的骸骨做成珠串来佩戴，有的人将剥下的动物皮毛制成衣服。如果说从人类原始时期就发展而来的穿皮草的风俗有其可理解之处的话——人们用猎获的动物毛皮制成衣服来蔽寒，或宣扬自己的成就，那么用小牛皮、蛇皮、羊皮、猪皮等来装帧书籍，这样的趣味就几近变态心理，而那些利用从人体上割下的乳房（特别是乳头）来做书籍装帧的趣味，就是真正灭绝人性的暴力了。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我们就已经读到了西方人用人皮来制作皮瓶的记载。在荷马对特洛伊战争的叙述中，我们就读到了阿基琉斯用铜枪刺死赫克托耳之后，又如何凌辱后者尸体的非人暴力。¹¹倘若要从西方各种文献中去搜集并列举这类记载，那将是一项令人毛骨悚然而又无法穷尽的工作。除开这样的工作，我认为西方文明史中对人所施加的暴力，以人皮来进行书籍装帧当属暴力中的暴力。按照赫尔布洛克·杰克逊的考察，在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都曾出现过用人皮来做装帧的书籍，在美国曾经出现过用人皮制作的扑克。¹²

在当今西方人的文化中，在他们的语言、动作、雕塑、电影、电视、绘画艺术、戏剧舞台、电子游戏、流行歌曲之中，无时无刻不晃荡着暴力的身影，在他们的校园生活中、在他们的家庭生活中、在他们的宗教生活中，在他们处理国际关系的过程中，到处都有暴力的踪迹。

在当代西方的通俗文化、流行文化、大众文化领域内，充斥着大量暴力内容，对于暴力趣味的追逐往往又是同西方文化历来的尚武、掠夺等特点密切相关的。以西方世界开发的多款游戏为例，如《红色警报》、《帝国时代》、《战争机器》、《拿破仑：全面战争》、《坦克世界》等无一不充斥着暴力的痕迹，这些游戏一边追忆着西方世界过去征战杀伐时代的武功，一边渲染着弱肉强食的丛林哲学，让玩家在享受紧张、刺激的厮杀与屠戮快感的同时，渐变成暴力的拥趸，让西方文化最为血腥、残暴的特质弥漫并浸透到无远弗届的领域。

对于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人来说，上帝创世无疑就是西方文化的开端。在这样开天辟地的历史阶段，却发生了一桩惊天动地、影响深远，同时又疑云丛生、众说纷纭的谋杀案，那就是该隐谋杀亚伯。正如雅各比在《杀戮欲》一书中用极具文学色彩的笔法对此所作的叙述那样：

“该隐就和他兄弟亚伯谈话。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当他们在田里的时候，该隐起来反抗他的兄弟亚伯，并且杀了他。”这就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共有世界中的第一桩谋杀案的细节。动机？不清楚。手段？不清楚。惩罚？不清楚。亚伯被该隐杀害一直被称为“第一次种族灭绝。”¹³

按照西方文明史的叙事逻辑，该隐杀亚伯一事，成为了西方人所说的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桩谋杀案，因为“人类的一半杀害了另一半。”雅各比顺着这条线索，将他的研究一路梳

¹¹ “他（阿基琉斯——引者）把赫克托尔的双脚/从脚踝到脚跟的筋腱割开穿进皮带，/把它们系上战车，让脑袋在后面拖地。/他跳上战车，举着那副辉煌的铠甲，/扬鞭驱策那辆匹战马如飞般捷驰。/赫克托尔拖曳在后扬起一片尘烟，/黑色的鬃发飘散两边，俊美的脑袋/沾满厚厚的尘土，……/” [古希腊]荷马：《伊利亚特》，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第579-580页。

¹² 参看叶灵凤：《读书随笔》（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1月第1版，第398-406页。

¹³ [美]拉塞尔·雅各比：《杀戮欲——论自该隐和亚伯至今的暴力根源》，“前言”，姚建彬译，第1页。以下凡引述该书，不再出注。

理到了今天，得出结论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种该隐杀亚伯式的兄弟相残（它表现为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朋友间的暴力、邻居间的暴力、同一宗教的不同派系之间的暴力等形式）构成了西方暴力的主要形式。

如果我们仔细回顾人类已经发生过、正在发生的以及将要发生的一桩桩、一件件谋杀案，该隐杀亚伯一案本身并无独特之处。换句话说，在西方文化史的暴力长河与谋杀档案库中，该隐杀亚伯一案，从表面来看就像其他任何一桩暴力一样寻常。但是，如果稍加深究，则不难发现潜藏在这桩谋杀案底下的一个重要秘密：该隐和亚伯原本是兄弟，他们是具有血缘关系的直系亲属。

暴露这一秘密，无疑让西方人的脸上颇失光彩，也无疑让非西方的读者体会到深刻的反讽或悖论意味：到处以宣扬平等、自由、博爱为荣的西方文化，竟然是以兄弟相残而发端的。根据雅各比的研究，在几千年以后的今天，西方文化的这种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变。

雅各比冷静而深刻地对西方人自身的文化弊病进行了判决，从西方文化自身的视角断言：尽管西方世界有关暴力，有关其起源、历程以及预防的研究浩如烟海，然而西方世界迄今尚未认识到植根于西方文化中的一条主线：暴力的主要形式是兄弟相残。

最具讽刺意味也最具启示意义的事情之一是，作为当今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本身就是在血腥的暴力和残酷的迫害中崛起的。但是，一旦它被宣布为国教，一旦它赢得了众多信徒以后，它马上就开始了肆无忌惮的种种暴力活动，而这些暴力的现身，无一例外都是打着“传播福音”、扫除异端邪说的名目。以信仰、友爱、宽容之名四处传播的基督教，却是踩着暴力的步伐不断拓展其征服不同民族的精神疆域的。基督教的历史，与无数的暴力纠缠不清，除了对于异教徒的迫害和肉体摧残直至毁灭外，更为恐怖、后果更为恶劣的则是对于“自由表达思想和集会”之权利的禁锢，这成为基督教专制的开始。

公元 313 年，君士坦丁大帝首先以罗马官方名义承认了基督教会，这标志着对于基督教的最后最疯狂的迫害终于结束了。其后在 392 年，基督教终于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这标志着基督教的地位已不可动摇，开始了在西方文化史上惟我独尊的时代。正如茨威格所指出的那样：“一旦一种教义或者一种学说成功地掌控了国家机器和所有的镇压工具时，这种教义或者学说就会毫无顾忌地实行恐怖统治。谁怀疑它的绝对权力，谁的言论自由就会被剥夺，甚至他的喉咙也会被掐断。”¹⁴很快，主教的势力横扫欧洲、亚洲和非洲，所有的臣民必须以天主教的形式接受基督教，所有继续忠实于“可耻教义”的人，全都要自食拒不执行法律的恶果，被流放到远方或被处以极刑。

在基督教升格为国教的过程中，地中海古代世界各地的庙宇逐渐荡然无存，罗马共和国时期遗留下来的神像被没收、偷盗、砸碎，许多“异教徒”被杀害；在亚历山大城，狂热的修士们烧毁了著名的塞拉皮斯神庙，教区的僧侣们闯入亚历山大大学，残忍地杀害最后一位伟大的柏拉图学派女哲学家海帕蒂亚，将其碎尸后丢到大街上喂狗；在罗马，丘比特的庙宇被关闭，古罗马信仰的经典《古罗马神言集》被付之一炬；在高卢，古老天神被宣布为基督教义中魔鬼的前身，虽然有时农民会起来保卫自己心爱的天神，但军队马上就会赶来，用刀剑和绞索平息“撒旦的叛乱”；在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被禁止，雅典大学被

¹⁴ [奥]斯蒂芬·茨威格：《良知对抗暴力——卡斯特里奥对抗加尔文》，舒昌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3月第1版，第12页。

关闭，哲学家被驱逐出境。至此，辉煌的古代世界终结了，文学、哲学以及更遭基督徒痛恨的数学和天文学，被掩埋在罗马和雅典暗无天日的废墟之下，要再过六百年才能重见光明，在这以前，人们只能战战兢兢地对待文学艺术，听凭神学家的摆布。¹⁵

基督教历史上最为常见的暴力，就是对于所谓异教徒的镇压。教会的支持者在为残酷镇压异教徒而辩解时，讲得都头头是道。他们说：“教会和其它组织一样，犹如一个村庄、一个部落和一片森林，必须有一名总指挥、一套明确的法规和细则，所有成员都必须遵守。一切宣誓效忠教会的人就等于立誓尊敬总指挥、服从法规。如果他们做不到，就要根据他们自己做出的决定，自试其法，从教会滚出去。”¹⁶

基督教向来把自己视为世界宗教的正宗，是天地间至高无上的惟一神教。对于基督教来说，其他的宗教，其他宗教的神灵都是异端，都是不能让人容忍的。当新先知穆罕默德出现之时，整个欧洲几乎为之崩溃。从这个时候起，西方人的文学中就充斥着有关“异教狗”和土耳其人残酷恶行的故事，西方人从这样的阅读经验中获得如下印象：“耶稣和穆罕默德各自代表的思想是水火不相容的”。然而，“其实，他们俩是同一种族，说同一语系的方言，都把亚伯拉罕奉为始祖，都追溯到同一个在一千年前矗立于波斯湾畔的祖籍。”¹⁷不仅如此，这两位大师的追随者也是近亲，但是他们长期以来对于彼此都“怒目而视，虎视眈眈，他们之间的战争已经打了十二个世纪，到现在还没有平息。”尽管“的确曾有一回，罗马的头号敌人麦加差一点接受了基督信仰”¹⁸。然而，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和解似乎是不容假设的妄想，只要想一想本·拉登对于西方文化所发出的种种犀利抨击，只要琢磨琢磨最近的阿尔及利亚人质事件的起因，只要再次回顾一下“9.11”事件的袭击者所秉持的文化圣战理念，只要回放一下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我们就应对此确信无疑。

基督教不仅与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其他神灵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由此引发了无数的暴力纷争，而且其内部也充满了暴力的分裂和冲突。也正因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雅各比要把他对于暴力根源的讨论，追溯到《圣经》创世纪中所记载的该隐杀害亚伯这一著名谋杀案。

正是从这桩著名的兄弟相残谋杀案出发，从罗慕路斯与瑞摩斯为如何建造罗马城而引出血案一路往下追踪到当代社会，雅各比发现，西方社会所遭受的威胁，主要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的陌生世界。按照他的考察，暴力的历史，与西方的文明史一样长久。他在《杀戮欲》一书中所作的研究，展示了其一贯的视野开阔、材料丰富的研究特点，探讨了从《圣经》中该隐对于亚伯的谋杀，到罗慕路斯对瑞摩斯的杀害，再到十六世纪的宗教战争，尤其是胡格诺教徒同新教徒之间的宗教冲突、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暴力、西方诸多国家的内战中的暴力冲突，再到二十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犯下的大屠杀暴行。在雅各比看来，人类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一个民族，之所以诉诸暴力，并不是因为施暴者与受暴者之间存在着差异，而是因为彼此之间的差异消失了。当同化程度越来越大时，更多

¹⁵ 以上的材料主要参考房龙《宽容》一书。具体参见[美]房龙：《宽容》，连卫、靳翠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9月第1版，第90-107页。

¹⁶ [美]房龙：《宽容》，连卫、靳翠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9月第1版，第105页。

¹⁷ [美]房龙：《宽容》，连卫、靳翠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9月第1版，第113页。

¹⁸ [美]房龙：《宽容》，连卫、靳翠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9月第1版，第113页。

同质的团体之间的竞争就会相应增加，因为摆在他们之间的同样有限的资源就会成为彼此争夺的焦点，而争夺的必然手段之一就离不开暴力。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来看，随着不同民族之间的趋同性日益增强，随着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向发达国家靠近，这两大阵营的国家之间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而导致的冲突和暴力也越来越剧烈，越来越明显。

大多数情况下，暴力来自于团体内部，而不是团体之间。根据雅各比的梳理，大多数的暴力都是产生于社群的内部，而不是兴起于社群之间。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是，我们通常以为暴力来自于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西方文明的历史进程却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势不两立的仇敌往往是由一些细小的差异所造成的。雅各比穿越西方数千年的文学、历史、神话和宗教领域，为他这种不同于流俗的见解提出了翔实而极具说服力的证据，并据此展开了卓有成效的论证。以巴尔干半岛为例，此处错综复杂的“冲突起源于几乎不可见的差别”，“交战的双方虚构了民族的神话和历史，有意掩盖这一事实：克罗地亚人、穆斯林和塞尔维亚人几乎是难以区分的。”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血腥的争执由于社会内部细微的，几乎是无法察觉的原因而发生了。”一位报道巴尔干半岛战争的新闻记者克里斯·赫吉斯赫，曾经目睹因为心形姜饼曲奇的起源而产生的争论差点儿转变成了暴力：“克罗地亚人坚持认为这种曲奇是克罗地亚人的；塞尔维亚人则愤怒地反击说，这种曲奇是塞尔维亚人的。”塞尔维亚人、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就像一座小小蚁山上的蚂蚁们一样争斗，为的是开辟出独立的、对抗的身份认同”。这种情况，在塞浦路斯的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之间，在伊拉克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在爱尔兰的新教徒同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之间，在胡格诺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时候，仅仅因为各自所抽的香烟的牌子不同就有可能导致暴力冲突乃至流血牺牲，西方文明中的这种几近荒诞的怪相，让人惊诧、警醒。

在西方，都市文明，也许还有政治本身，就是从自相残杀的暴力中兴起的。不仅如此，暴力还是西方文化输出的重要推进器。西方人不仅用暴力手段或者用暴力本身来开创、推进并发展他们的文化，而且将暴力作为他们进行文化输出的重要手段。我们在十字军东征、地理大发现、奴隶贸易、东印度公司发展、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等重要的历史事件或者历史时刻中，均不难发现作为其推进器的暴力的“光辉”形象。“自 16 世纪以来，世界上的公理正义的标准大部分是欧洲人制定的，当西班牙人在西半球建立他们血腥的殖民统治的时候，使用的是所向无敌的毛瑟枪，打的是替天行道的旗号。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以后，英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暴力又加上了进步、工业、科学、民主和法制等装潢。”¹⁹

让我们以十字军东征为例来看看暴力是如何为西方文化的输出鸣锣开道、推波助澜的。熟悉西方文化的读者都知道，十字军东征是在罗马天主教教皇准许下进行的一系列宗教性军事行动，是由西欧的封建领主和骑士对地中海东岸的国家发动的战争。当时原属于罗马天主教圣地的耶路撒冷落入伊斯兰教手中，为了收复失地，罗马天主教便发动了多次东征。但有一些东征是针对天主教以外的其他基督教派，而并非针对伊斯兰教，如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就是针对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从公元 11 世纪到 13 世纪的近 200 年时间里，罗马教廷先后动员了总计逾 200 万的十字军。十字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表面上看，

¹⁹ 陈嘉放、邓鹏：《文明与暴力》，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年 3 月第 1 版，第 9 页。

十字军是为了将基督教圣地即耶路撒冷与信徒从所谓异教徒的蹂躏之下拯救出来，但实际上是罗马教廷扩大天主教势力范围的精心策划。教皇英诺森三世就集中地体现了罗马教廷的扩展雄心，他“不仅管理了教会，而且还左右了整个世界”。英诺森三世把驻罗马的帝国官吏赶出城去，再次征服了由帝国军队控制的那部分巴尔干半岛，最后把皇位继承人逐出教会，使那个可怜的王太子身陷困境不能自拔，乖乖地放弃了阿尔卑斯山东面的领地，使意大利从日尔曼人手中解脱出来。他组织了闻名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不过压根儿没去“圣地”，而是奔向君士坦丁堡，屠杀了城里的大批居民，把金银财宝掠夺一空。

毫无疑问，十字军东征给包括骑士、农民、小手工业者在内的欧洲人提供了一个无可抗拒的机会，让他们由此去赢取名声、搜集战利品、谋取新产业或统治整个国家——或者只是以光荣的冒险去逃避平凡的生活。在表面的宗教狂热之下，奔涌的是西方人对于财富、功名乃至荣誉的毫无止境的追逐。

这场以政治、宗教、社会与经济目的为主而发动的对亚洲西侧的系列侵略劫掠战争，造成了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深刻仇恨和严重敌对。尽管从 1096 年至 1291 年间共进行的 8 次东征最终都遭到了失败，然而却使得东西方教会在历史上留下了有名的暴行，为天主教会“赢得”了永远也无法涂抹掉的污名。

在后来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在西方拓展世界市场和海外殖民地的过程中，西方一方面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等传播到世界各地，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却无法回避一个基本事实，西方的科技福音也好，宗教福音也好，民主福音也好，都是以令人发指、空前绝后的暴力为推进器而传播的。在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人对于世界各地土著人的屠杀，就是西方以暴力为推进器的文明征服世界之旅的血腥证明。众所周知，印第安人是拉丁美洲最早的居民。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印第安人”，主要是因为当年哥伦布等探险者，误以为他们登陆的“新陆地”即巴哈马群岛中的圣萨尔瓦多岛（San Salvador）是印度，故而称当地居民为“印第安”人。欧洲发现美洲，是印第安文化遭受灭顶之灾的重要开端。在一批又一批纷至沓来的欧洲殖民者的袭扰、屠戮之下，美洲的印第安人遭到了空前绝后的灭绝，“17 世纪初，当第一批英国殖民者踏上北美的土地时，美国的土地上当时大约居住着 450 万印第安人。到 1860 年时，印第安人的数量已经减少到 30 万左右。印第安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只剩下 10 万上下。”²⁰如果把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等欧洲殖民者在拉丁美洲和南美洲所屠杀的印第安人算在一起，整个美洲被灭绝的印第安人总数将是极为令人恐怖的。

再比如，臭名昭著的奴隶贸易也是西方文明传播史上龌龊、污秽、残暴、恐怖的一页，许多西方国家都在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最先从事奴隶贸易的是葡萄牙人，其后，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美国都先后卷入了这种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奴隶贸易活动之中。在奴隶贸易的初期，殖民者曾组织所谓的“捕猎队”亲自掠奴，偷袭黑人村庄，烧毁房屋，把黑人捆绑着押往停泊在岸边的贩奴船，往往一夜之间把和平宁静的黑人村庄踏为荒无人烟的废墟。殖民者的野蛮暴行，遭到了非洲人民的反击。后来殖民者改变了方式，以枪枝、火药诱骗某些沿海地带的部落酋长，唆使他们向内地袭击，挑动部落之间的战争，以便在交战中俘虏对方部落的人，出卖给欧洲的奴隶贩子。由于欧洲殖民者的挑动，这种

²⁰ 陈嘉放、邓鹏：《文明与暴力》，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年 3 月第 1 版，第 20 页。

部落间的“猎奴战争”，在 400 年的奴隶贸易过程中始终没有停止过，造成了非洲黑人的大量死亡。

运到美洲的黑奴，在种植园主或矿场主的非人待遇下，有 1/3 的黑人在移居的头三年死去，大多数人活不到 15 年。每运到美洲 1 个奴隶，要有 5 个奴隶死在追捕和贩运途中。在长达 400 年奴隶贸易中，估计从非洲运到美洲的奴隶大约为 1200 万—3000 万。整个非洲大陆因奴隶贸易损失的人口至少有 1 亿多，相当于 1800 年非洲的人口总数。奴隶贸易使非洲大部分地方呈现一片荒凉景色，而欧洲奴隶贩子却从中赚了大量钱财，这客观上加快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促进了欧洲的经济繁荣。大批的黑人奴隶为美洲的开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这样的繁荣和发展，是以黑人所遭受的史无前例的毁灭性暴力为推动力的。也正是从这样触目惊心的历史真相出发，我们才能深刻领会马克思所作的深刻论断：“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²¹。

暴力不仅是西方文化输出的推进器，也不仅是西方文化的根本性特征，暴力还是西方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精神分析学已经对于暴力与人的自我认同做了很好的研究，我们由这样的研究也不难理解，暴力与西方的集体/民族/社群的身份认同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从该隐谋杀亚伯开始，西方文化就暴露出了一个重要秘密：为了保证自己的身份，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为了维护自己的开化、文明、进步的形象，就必须杀掉自己的敌人，哪怕这敌人是自己的手足同胞。很多情况下，当敌人并不存在时，为了巩固自我认同，就必须假想、虚构出一个敌人，从而为实施暴力提供合理的依据。以美国当今的全球战略为例。为了确保自己的本土安全，美国不惜耗费巨资，建立全球防御体系，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布设军事基地、导弹防御体系，以便在第一时间能够有效打击它设想出来的一个又一个敌人。为了保护美国人所宣扬的民主、自由，在“9.11”之后，它炮制并完善了关于“邪恶轴心”国的叙事逻辑，在 2005 年，它又提出了包括六个国家在内的黑名单。按照美国的霸权逻辑，“任何持有或谋求对联邦共和国具有威胁力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都是敌人”。无论是邪恶轴心国，还是六个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国家，一旦这些国家中有威胁美国本土安全，有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动向，美国都将有权对其进行“斩首”。雅各比说，“城市的历史印证着暴力”。我们大可以在他的基础上往前再作推论，全球化的历史，或者说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历史，也将印证着暴力。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从暴力的视角对西方文化所做的上述讨论，既不是为了鼓励大家去做一个仇视西方文化的狭隘民族主义者，也不是为了在读者心中激起怨妇、泼妇或者愤青的心态，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无非是让我们有像雅各比一样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以批判的眼光来认识和理解西方文化，也以同样的眼光来认识和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真正做到胸怀天下，以宽容和非暴力之心，去成就一个真正有人文精神、人文理想和人文追求的知识分子，既不盲目追赶西方的月亮，也不盲目夸耀中国的月亮。

雅各比在《杀戮欲》这本小书中提出的诸多观点，他对西方文化种种暴力根源的发掘与剖析，以及他在本书中所探讨的一些问题，与他此前的《不完美的图像》及《乌托邦之死》都有直接的相关性。按照笔者对于雅各比学术思想轨迹的大致梳理和粗浅理解，我认

²¹ [德]马克思：《资本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 871 页。

为雅各比对于暴力是持反对态度的，他对于人类的美好未来是抱有美好期待的。正因如此，他才在本书结尾处援引李维的叙述，认为萨宾女人当年为遏制兄弟、父子、丈夫之间的仇杀所作的努力至今仍然可以给我们启示。也正是因为人类的生存时时处处遭受着暴力的挑战和威胁，我们才有必要像雅各比一样进入历史的深处，剖析产生暴力的种种根源，揭示种种暴力的血腥、恐怖场景，呈现暴力的种种残酷后果，从而为人类的未来发展提供深刻的警示，并激励人们寻找规避或减少暴力，走向美好未来的可能途径。

就我个人的理解而言，为人类的福祉计，为文明的未来计，反对具体的暴力、肉体的暴力的紧迫性，远不及反对思想上的暴力、体制上的暴力来得亟切，“因为思想界始终知道，为了抵御任何一种奴役，思想界要始终拒绝用规定的模式思维，拒绝让思想界自己变得浅薄、停滞、厌倦、鼠目寸光和唯唯诺诺。”²²为此，我们就“应该反对那些声称为维护自己的‘唯一真理’而使用暴力的偏执狂人们”。²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雅各比的《杀戮欲》一书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不仅仅是他所梳理出的、内在于西方文化的兄弟相残暴力的历史线索及其演变，也不在于他对于西方多种暴力根源的细致剖析，甚至也不在于他所揭示的那些发生在西方文明史上的暴力真相，而在于他以自己的研究所表达的对于西方文明的批评、针砭与警示。他在《杀戮欲》中所做的工作，或者说他通过此书的写作所表达的立场和姿态，就像《皇帝的新装》中里的那个小男孩。雅各比不仅提出了与西方传统的集体智慧和流俗见解相反对的真理性看法，而且勇敢地将其表达出来，为西方文明内部及其之外的人揭示了某种自由思考的空间。

是为序。

姚建彬

2013年1月30日于雾霾四合锁京城中

²² [奥]斯蒂芬·茨威格：《良知对抗暴力——卡斯特里奥对抗加尔文》，舒昌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3月第1版，第8页。

²³ [奥]斯蒂芬·茨威格：《良知对抗暴力——卡斯特里奥对抗加尔文》，舒昌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3月第1版，第9页。